

核算,提高经济效益。但也有消极作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也会产生盲目性。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同国家宏观计划目标之间、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之间的矛盾是经常存在的,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眼前的局部利益,就会盲目发展那些暂时价高利大的产品,甚至一哄而起,重复布点。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如何自觉地利用商品经济规律的积极作用,并限制其消极作用。

三、计划调节为主,还是市场调节为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经过这几年的计划体制改革,指令性计划已大为缩小,但指令性计划加上指导性计划,还占主要比重。有人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市场经济混淆起来,主张以市场调节为主。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在实行计划调节中,要研究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市场调节为主。

四、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管理。在这里,市场调节是客观存在,计划调节是主观反映客观的东西,它们两者之间不是互不相干的两块,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计划调节要反映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自觉运用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有效地实现计划调节;而市场调节,又必须在加强和改善计划指导的情况下,才能发挥积极作用,避免消极作用。要加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还必须进一步改革计划体制。现在有人主张以市场为中介,国家对企业不实行直接计划管理,而是运用经济调节手段左右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按国家宏观计划目标进行活动。也有人把这种主张概括为“计划控制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实际上是不要计划,属于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看来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五、对宏观经济的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并在竞争中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经济效益。因此,国家对企业的管理,要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到间接控制为主,以便扩大企业自主权,把微观经济搞活。现在有不少同志主张国家对宏观经济的控制,也要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到间接控制为主,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宏观经济控制方面,既要有间接控制,也要有直接控制。在间接控制方面,主要是做好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平衡,安排好积累和消费、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运用价格、税收、利率等经济杠杆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在直接控制方面,国家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重大基本建设项目,职工工资总额,货币发行量等,都需采取直接控制,以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 必需打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陈旧观点

黄逸平

在当前改革开放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哲学、社会科学亟需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中国近代经

济史也不例外。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有其特有的重要意义。它为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旧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国情,并从中总结经济发展的规律,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非常必要。

在以往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主要是在搞论证,即只是在已定的传统观点和框框下搜集资料、注释证明而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解放了思想,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少学者在掌握和分析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开始对若干较为陈旧的观点进行质疑,相应地提出较为切合实际的见解,使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例如,回顾近百年开放的历史,尤其是关于旧中国引进外资问题,人们已不只是片面论述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和奴役性的一面,而是开始注意了它对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作用。关于旧中国自然经济瓦解的程度问题,扬弃了过去认为农村自给自足经济已基本解体的不切实际的观点,作出了较为恰如其分的估计。对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问题,传统的观点都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近代民族资本工业产生开始,现在发现在七十年代前商业中就早已出现了资本主义关系。过去把凡是向国外采购设备、原材料、雇请外籍技术人员,把凡是与外商进行交易活动的商人,都谓之买办性或买办商人,这种把买办性无限扩大的陈旧观点,已日益不为人们所赞同。其它诸如洋务派经济活动的历史作用、官僚资本等问题的研究,均有所进展。但是应该看到,这还仅仅是开始,不少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为中国近代经济史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诸如对外经济关系和中国近代化、引进外资、中国近代化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历史上的中外合资企业、通商贸易与城乡经济变动、改革开放与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中国传统手工业与农副产品产销出口情况、地区经济的历史调查等等。这些新课题的探讨,无疑会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向纵深发展,也结合了改革开放的实际。

但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创新发展,主要关键还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实事求是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不切实际的陈旧观点的思想束缚,克服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正如前述,这种陈旧观点在近几年已有若干打破,但它仍相当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认识。例如关于引进外资,经过讨论已有人提出若干新见解,认为它是后进国家加快实现工业近代化的必由途径。贷款附有动产不动产抵押、派遣顾问监督等条件是资本主义借贷的常规,某些外资的引进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确是起了推动作用。但是长期来那种把附有前述条件的借款笼统地都视为帝国主义奴役性借款,是经办者出卖国家主权的卖国行径的传统观点,在人们认识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究竟哪些类型的借款具有出卖主权的性质,哪些类型则不是,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再如近代买办,在研究中已发现类似郑观应应具有民族性格的买办尚有其人,但过去对他们不加具体分析的都视为“引狼入室和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是外国侵略者豢养的奴才、走狗、帮凶的传统观点,仍影响着人们对买办的深入认识。曾经当过洋行买办者,除有数人外,都还被视作“终身”买办,看不到他们的转化。与郑观应同时代担任过买办的唐廷枢,从事近代民族企业的活动远较郑观应显著,只是因为没有象郑观应著有《盛世危言》那样表达抵制外国资本要求发展民族资本思想的著作,就长期被当作买办看待。与外商洋行和银行发生金融关系的钱庄,至今仍被视为具有买办性或买办化的封建钱庄。其它如官僚资本、中国民族资本在第一次大战后是萎缩还是继续发展等问题,无不受陈旧观点的影响。因此,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亟需打破陈旧观点的思想束缚,才能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领域内,辛亥革命后的专题,尤其民国经济史的研究甚为不足,今后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也甚为重要。

## 要创新,必须“活”

蒋 孔 阳

前不久,《联合时报》报道了谢晋同志与同济大学学生的对话,谈到中国的球类运动员与外国比赛,有网的,如乒乓球、羽毛球、排球,都赢,都取得了冠军,而没有网的,如篮球、足球,则很少赢,很少取得冠军。这是为什么呢?他说,这是因为在网子之内,我们中国人思想解放,精神活跃,所以能够发挥浑身解数,打出最好的水平。而当网子拿走了,与外国人混战一起,我们不习惯,心理上有压力,因此展不开我们的本领。

事情是不是果真如此,那是另一个问题。但它却启发了我们:在竞赛中要取得胜利,必须思想解放,精神状态良好,心中眼中都没有顾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脑子活,身子活,才能生龙活虎,打出最好的水平。

哲学社会科学,与球类比赛,当然有所不同。但是,如果要创新,要发展,要取得优异的成绩,其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其所需要的精神状态的“活”,应当说远远高于球类。这就因为它本来是一种精神活动。精神活动而没有活跃的空气,没有自由自在的环境,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当你正在灵思妙悟、浮想联翩的时候,有人却在你的脑神经上拴上一根弦,要你跟着他左转右转,试问:这时你还能有什么作为?建国以来,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发展,那不也因为党的“双百”方针在美学领域中贯彻得比较好,因而美学界的思想比较活吗?不管你讲美是主观的或是客观的,不管你介绍的是弗洛伊德的心理或是格式塔的心理,可能有人不同意你的意见,但却没有人给你打棍子,更没有人禁止你的讲话。正因为这样,所以美学一时成为热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哲学社会科学要创新,要发展,关键的关键,还在于一个“活”字。

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的并不在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实际问题。实际问题不仅非常多,而且时时在随着现实的变化和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我们要全部从理论上解决,不仅困难,而且用不着。不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哲学社会科学还有什么用呢?我们说,有一个大用,那就是联系实际,展开各种各样的研究和讨论,活跃人们的思想。只要人们的思想活起来,这时,整个社会自然会生气勃勃,热气腾腾,从而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然后在各行各业中,大显身手,做出优异的成绩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本身要“活”,而且它还要使整个社会“活”。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哲学、社会科学要创新和发展,必须“活”!